

壹、研究背景、目的及名詞釋義

教科書是文化財，也是經濟商品。教科書設計雖是教育專業的事務，但它並非教育專業獨立運作的結果，而是歷經「研編系統」、「審查系統」、「出版系統」、「行銷系統」及「選評系統」之運作結果。首先，教科書的生產不是個人創作結果，而是透過「研編系統」運作下的群體智慧結晶，其參與人員包括學科專家、課程專家、編寫作者與編輯人員等；其次，在國家課程治理的施展下，它受到「審查系統」中規範與審查意見的約制；復次，在印刷科技發展的脈絡下，它會受到「出版系統」中編排與印刷軟、硬體等的影響；再次，在市場經濟的邏輯運作下，它受到「行銷系統」中的市場評估、調查及使用者回饋等之牽制；最後，它受到學校中教科書「選評系統」的影響，諸如教師的選用取向、售後服務要求等。總之，教科書設計雖是教育專業的事務，然而，在教科書的生產過程中，「研編系統」、「審查系統」、「出版系統」、「行銷系統」及「選評系統」等五個系統是動態、交互影響的，其運作與交互運作的結果，最終都會回饋到「教科書設計」，並對其產生影響。有一些研究即指出，教科書內容的定案是經過審查機制、現場教師的反應、市場操作後的結果，其最終所呈現出來的內容與形式，與其編輯團隊原先宣稱的設計理念與原則是有落差的，具有向市場傾斜的「內容簡單」、「容易教授」、「容易批改」、「內容趨同」等特性（邱千芳，2006；鄧鈞文，2001）。

一、研究背景、目的

確實，在教科書全面開放審定制迄今十多年間，各類民間編輯教科書常遭抨擊日益趨同化、品質未見提升（陳麗華，2008），議論其原因者更不乏其人，歸納眾多原因，有的歸責「研編系統」：課程綱要修訂加列分年教材綱要、教科書編輯以迎合教師要求為考量（楊國揚，2009），欠缺教材研發與試驗（洪孟珠，2004；陳文典，2009）；有的歸責「審查系統」：教科書審定尋求各版本之最大交集（楊國揚，2009）；有的歸責於「出版系統」：教育部對於教科書出版在紙張、字體、頁數、定價等方面的諸多規範，讓教科書的規格頗為定型（陳麗華、

詹寶菁，2010）。有的歸責於「行銷系統」：教科書行銷以市場為考量，力求符應考試文化，家長期望標準化思維以利考試公平等教育的庶民理論主導（游自達，2009；楊國揚，2009），教科書聯合計價與議價制度使各縣市競相展現殺價能力，導致教科書微利化，業者不願意投入研發等（陳麗華、彭增龍、李涵鈺，2008）；有的歸責於「選評系統」：教師選用教科書基於備課便利與考試（楊國揚，2009）。綜觀以上，獨缺「教科書設計」方面的歸因，可見學術界對教科書設計的實徵研究之數量與成果有限，即使在美國亦然（Chambliss & Calfee, 1998）。加以近期臺灣課程改革的步調過於急躁，不論頒布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暫綱、正綱，以及修訂增列基本內容或分年教材綱要等，每次課綱修訂後，預留給教科書編輯、審查的時程都很匆促，致使編輯者不能迅速獲得教科書設計專業上的參照與協助，經常只能根據常識或過去受教的經驗編寫教科書，審查者對於教科書設計亦處於摸索狀態。根據李依茜（2008）的研究，高中「公民與社會」科教科書審查是結構規範與參與者（編者與審查者）自主行動的辨證歷程，編者與審定委員在審查歷程中面對結構規範，透過論述與具體的因應行動，使教科書結構與文本內容產生改變。卯靜儒（2012）研究發現，「高中歷史」科的編審雙方為了尋求最大公因數，編審教科書的討論過程仍是「文本中心」勝於「學習者中心」的思考邏輯。可見，教科書審查者和編者是教科書設計的夥伴，不管雙方是否認同此點，教科書審查的確對教科書設計產生影響。雖然編、審雙方都是學有專精的專家，然而，長期以來，社會科一直是學生認為最棘手的閱讀文本（柯華葳，1990；柯華葳、范信賢，1990；賴明貞，2005；Armbruster, 1988; Lovitt & Horton, 1991）。近期的報導亦仍指出，「小學社會科太難，家長批災難」，社會領域的內容太繁雜，地理充斥艱澀知識，有些問題連大人都難回答（翁禎霞，2010）。可見，社會領域教科書設計的良窳，關係著學生的閱讀理解與學習成效。

爰此，本文係從社會領域教科書審定機制運作的「人」——「審定委員」的視角進行探究，直接針對其在「教科書設計」專業上的關注面進行探討。目前關於教科書審定方面的研究不多，因其涉及公部門審定教科書時，程序不公開的公務機密原則，亦涉及出版社的商業機密，要進行田野研究之難度較高。近年來，學界已開始關注此研究範疇，且大多集中在社會領域之探討；有些從制度設計、